

編輯者 政論社
 社址：重慶榮園場正街廿六號
 零售五分
 預定半年七角五分
 全年一元四角

政論

旬刊

第一卷 第廿九期要目

中華民國廿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我們爲什麼反對法西斯時…… 陳獨秀
 日本對華中央機關設立之經過…… 張百高
 利日侵我此其時矣！…… 曹樹銘
 蘇聯外交與我國國策…… 孫殿存
 英美外交關係…… W. T. Morison
 戰後的政治經濟思想…… 鄭學稼
 國際情勢的轉變我們今後應有的努力…… 夏實中

我們爲什麼反對法西斯特

陳獨秀

伯倫說：「任何國家，欲以武力統治全世界，余則認爲非抵抗不可，因此種之統治下，酷愛自由之人民統不能一日生存也」。羅斯福也屢次顯明的以摧毀民主，自由斥責希特勒之統治。東西兩半球這兩人民民主的政治領袖，對於法西斯制之批判，可謂切中要害。

全世界幾百年內戰爭和對外戰爭，六大部分是爲了自由。

自由爲什麼是如此重要呢？

人類之所以能超越羣獸，而爲之靈長，正因爲主思想之大腦，別於禽獸。生物學家，人體生理學家，同樣告訴我們：人體及一切生物器官，愈用愈發達，愈不用則愈退化以至消滅，法西斯的統治，是要停止人們思想之自由，全德國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圖把全國人變成無知的牛馬，隨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轉動，人們失了思想自由，大腦自然廢而不用，日久不用的器官，自然只有退化消滅，人類因爲能够自由思想，才由猴子變成人類；法西斯統治停止自由思想，會把人類變成猴子。這是法西斯統治發展的自然邏輯。即短時期不至變爲猴子，而失去公法上自由的人民，除了絕對服從奴隸道德外，不能以任何道德的及政治的責任。

希特勒爲德國自由而撕破凡爾賽和約，我們是應該舉起雙手贊成的；然而事實上得着自由的，只是希特勒及其黨徒，其餘的德國人成了希特勒的牛馬奴隸，這又何能稱得到全世界所愛自由的人士之同情！

號稱民主共和國的捷克，直到國家垂亡的今天，最近改組的蘇拉維內閣，以與捷克民族作者網的斯拉伐克民族無一人參加；斯拉伐克自治政府和立法機關，斯拉伐克省以斯拉伐克語文、正式文字，今天才被容許；（斯拉伐克民族或者可感謝希特勒！）其對待他民族可知。任。曼說：「捷克蘇台區內之人民，素在毫無生趣之情形中渡其時日，直至三四年以前，德國給予彼等一線希望。」捷克民族所獨霸之政權，其對待異民族之專橫，我們不啻爲之談，希特勒高呼爲捷克境內的日耳曼民族自由而奮鬥，也未嘗不動人聽聞；然而我們問：日耳曼人在捷克無自由，歸併到法西斯統治下的德國，自由又在那裏？如果希特勒任錫曼認爲捷克境內的日耳曼人處在十八層地獄，我們則認爲德國境內的日耳曼人是處在十九層地獄！

希特勒大聲攻擊別國國家，「自稱爲獨裁制之政府，其存在全賴屠殺冤獄者，反被譽之爲民主政體。」我們固然沒有一點理由爲這一獨裁政府辯護，我們却可以動希特勒拿鏡子照照自己，免得只看見別人，看不見自己。也不能以別人吃酒酪來作爲自己抽鴉片烟的理由。希特勒誇耀自己开辟了墨索里尼都爲「舉國人民百分之九十九所擁護之政府，其實一切獨裁政府，都要運套把戲，獨有民主政府辦不到，這正是牠的優點，因爲牠不敢像獨裁政府那樣無法無天的幹。

本年三月七日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有一段攻擊法西斯特的文章道：「全世界優秀的藝術家科學家思想家，都

日本對華中央機關設立之經過

張百高

日本政府所計劃的所謂「對華中央機關」在去年冬日本第七十二議會裏已經提過，但沒有具體的決定。到今年三月間近衛內閣才把這問題提出來正式討論。當時外務省方面與軍部方面的意見衝突得很厲害，廣州外相曾提出一個「外政省」方案出來，把原有外務省的職權擴大很多，而遭遇到軍部的激烈反對，廣田的去職據說與此事有很大的關係。到宇垣一成繼任外相之後又經過許多迂迴曲折磋商討論，到上月下旬各方意見似乎已大致接近。決定於上月二十九日下午四點鐘將近閉會的時候，宇垣跑到近衛家裏去，忽然提一辭，書，即刻就坐汽車跑到國立（地名）的別墅裏藏起來，再也不出來了。這件突如其來的辭職事件據九月三十日和十月二日的東京朝日新聞所載，大致如次：（標題是「被抑制了的反對」。）

本來在九月二十九日只要把二十八日夜晚陸海外三省事務當局間已經大家都贊同了的方案，關於字句的修正上，在外務省方面只要得到宇垣外相的承認就可以。但是在廿九日午前外務省首腦部的會議上，宇垣外相聲明其說是在關於字句的修正持有異議，無事說是在根本問題上對於對華中央機關的構成大綱表示完全反對。其反對的主要點是：

(一) 該機關不宜為執行機關。

(二) 若僅是限於佔領地區有關係則可以，若是關於全中國的，我自己在極端觀念上持有異見決不能相容。

那時宇垣只說：「關於這個問題一切由我自己

辦去，我現在就去和近衛首相商量好了再來」。說完就走出外務省，走去見近衛並提出辭表。出來回到自己家裏即刻就「國立的別墅」去了。

大體上這個所謂「對華中央機關」是在去年第七十二議會的時候，已經由有關係的方面加以研究。那時政府在議會裏也會聲明過將來準備設立這種機關。尤其是隨着「華北開發」和「華中振興」兩公司法制定之後，更加且轉地討論起來了，但很不容易具體實現出來。有關係的各當局想為焦慮。本來其間因為又發生過內閣改造以及改造後關於「中國事變處理」的政府的根本方案，為五相會議所應首先解決等等就擱了相當日子也未可知。

這樣關於對華中央機關到九月上旬才得到了陸海軍一致的方案預備拿來出到五相會議去的。這個對華中央機關對於這次事變的處理上是如何重要，及以不久攻陷漢口之後非火速設置不可的理由和該機關的目的精神如何等等在提出於五相會議的理由中表示如次：

一、中日接觸確立東洋永遠的和平是我國（日本）不動的國策。為達成這個目的單靠武力的強迫是不夠的，非結合一切方法與手段使中國民衆自覺中日接觸的必要及其合理性不可。

二、為此，非結合使用各般的力量在長期中維持下去不可，但是現在相當這事的機關併有其他的權限彼此分散不能為這個目的而集中起來。尤其是這種對華事務屬於現存機關原有事務範圍外的很多，而其內容

很滑稽的說，法西主義在「進攻」和「進攻」的進行。在這些法西主義者所行的國家中，所有優秀的國民都被「行動」封鎖了耳目。日本的進步思想家如先生說：「在日本文化已經失掉了、民衆的吐聲已經聽不到了。」

「文化」在「牢獄裏面」。法西主義的流氓們，要把世界拖回黑暗中古的時代，要把歷史向後轉，他們瘋狂的殺人放火，「焚燬坑儒」、顛倒是非，淆亂黑白。他們明目張胆的在進行破壞人類幸福的活動，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

這一段話真說的痛快淋漓！可是我們也要勸他們拿鏡子照照自己！凡是攻擊法西主義的人們，應該自己反省一下，有沒有和法西主義同樣的行為，不要在別人是「暴行」「橫行」「箝制」「封鎖」「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在自己便是政治鬥爭的正當手段，說什麼「只問目的，不擇手段」！

我們之反對法西主義，不唯其名唯其實，無論他掛的是何等金字招牌，無論他爲了何種目的，只要在事實上採用和法西主義同樣的手段，我們都一律反對。

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們，拿出毅力來救救人類的大難吧！不要跟着法西主義「把歷史向後轉」，不要領導人類退後到猴子的道路上去！

十月十二日

又廣汎複雜，各事務又互相密切關聯，所以若要使牠統一調整起來，則非重新設一個屬於單一系統的機關不可，此所以要設置「對華院」這種特立機關於內閣之內專門掌管這方面的事務。

三、所以陸海軍案的構想是爲實現真正舉國一致主張設置以總理大臣爲總裁的對華院掌管左列各事：

A，關於樹立對華諸政策的一切事務。
B，對於中國新政權的政治的經濟的內面協力一切事務。

C，關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之調查及計劃。以及關於其實施的事務。但對於中國的純外交則除外。

D，關於在華各種公司的監督及其統制上一切事務。

E，關於保持各種官廳對華行政之統一上一切事務。

F，爲使本機關與五相會議的連繫克保緊密起見，附設對華政策連絡委員會。依據經過五相會議決定的政策而担任其第二次的政策及必要的政策，由有關各官廳有關的官員充任。所以「對華院」既不減弱五相會議也不致產生與其相避諱的結果出來。更基於使本機關的活動成爲舉國一致的旨趣，承內閣總理大臣的諮詢，爲擔任調查審議關於中國的重要事項又設置「對華審議會」，以各相關官廳人員及具有學識經驗的民間人員爲委員。

法制局基於以上的主旨作成了一個官制案。外務省方面也提出了一個對案，其大要是：

一，各省(部)所管對華關係事務之連絡調整
二，華北、華中、兩廣策會社之監督事務。
這是一個很有限制的小規模的組織，在五相會議中雖然也會經提出審議研究過，但是外相却很慎重地研究着遲遲沒有進行本格的具體的審議。這大概是外相方面是立脚於對華政策的執行是應由外務省担任的根本信念上。而且關於五相會議與「對華院」的關聯等恐怕還抱着有疑念亦未可知。

然而這樣徒然在再遲延時日認爲不當。於是五相會議中又提出了第二次對案，其要點是「對華院」屬於總理大臣的管理，掌理中國事變中下列各事，但涉外事件除外。

一，陸海空軍在中國佔領區域內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各項事務。
二，關於國策會社的業務監督及統制上項事務
這是將「對華院」作爲中國事變外的暫定機關，其業務施行的範圍限定於日陸海軍佔領地內。而九月二十七日的五相會議將這個外務省案檢討的結果對於作爲暫定機關這一點沒有異議，但將管轄範圍區分爲占領地和非佔領地這一點認爲是在設立「對華院」的根本認識上相異，陸海軍方面斷然不能同意。五相會議後夜間又由陸海外三省的事務當局間會商的結果，擬定：

「對華院」屬於內閣總理大臣管理，在中國事變中掌管下列事務，但涉外事項除外。
(一)關於在中國爲處理中國事變所必要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各項事務。
(二)關於前項政策樹立上的各項事務。

(三)關於會社(公司)的監督及統制上的各項事務。

(四)關於官廳中與中國有關係的行政事務統一保持上的各項事務。

此外還有諒解事項是：

中央機關設立後同時在中國設立機關(對華院分局)，關於政治經濟及文化的業務，一律交其管理。又由五相會議樹立對華基本國策，本機關依此而樹立第二次的(次要的)諸政策，而且即是由本機關所樹立第二次的政策其重要的還是經過五相會議的承認。

以上是九月二十七夜陸海外三省事務當局間協定成立的，在外務省方面經過宇垣外相的承認，只等提出二十九日午後四時開會的五相會議。然而宇垣外相對於這日提出辭表堅持他的對於對華機關的反對態度。這種他之所以採取這個人意義的新動機的態度其動機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關於這一點近衛和五相會議的各自以及外務省的事務當局都是莫名其妙很不容易明瞭他的真相。二十九日宇垣訪問首相的時候恰好池田也相近衛在首相府，那時宇垣說：「我想和總理兩個人談一談，所以……」，因此那時池田和近衛走到書記官長所裏去，對書記官長這樣地說。

若是今天內不能決定，「明天止爲限一切都交給我吧！在池田做夢也沒有想到宇垣會辭職。不一會宇垣出來了告訴他已經提出辭職。事情來得太突然了。池田那時與其說是大吃一驚，不如說更感到很大的憤慨。所以宇垣辭職真是出人意外得很。因此有一部分人以爲宇垣這次的辭職條件是另外還有別的什麼條件也未可知。不過這個看法似乎太

過，了一點不見得確實，其實的情形恐怕還是由於他自始對於設立對華機關這件事，身根本抱着反對的態度，一直抑制住到今天才爆發出來，這再根本地說起來，最近內閣裏面對他的怨氣逐漸使他感覺得不舒服，這恐怕也是使他下決心的一個原因也未可知。總而言之，閣內外的評判對於這次外交的進退都不很佩服。

又據十月二日東京朝日新聞所載關於所謂「對華院」要綱抄譯如下：

這次提出於四相（因字垣辭）所以成了四相會議的「對華院」要綱全文如下。要綱中和以前事務當局所擬的妥協案在字句上不同的點是：

- 一，對華院的存續期間限於中國事變中。
 - 一，關於表示最妥當問題的對華院的權限，其字句改為「如中國事變期中要在中國處理」等字樣。
 - 一，作為對華院的諮問機關不用「對華院策審議會」改為「對華委員會」。
- 這就是這次方案的特徵。所謂「對華院」要綱如：

- 二，本機關掌管事項如左，但「涉外事項」除外。
- (一) 在中國事變期中，關於要在中國處理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各項事務。
- (二) 關於前項諸政策上的事務。
- (三) 關於依據以在中國經營事業為目的特別法律而設立的公司業務的監督及以在中國經營事業為目的而設立的公司業務的統制上各項事務。
- (四) 關於各官廳有關中國的行政事務的

統一保持上、項事務。

- 三，關於前項所規定的事項為使能與各關係官廳連絡處理各種重要事務在「對華院」中設置連絡委員會。
- 四，在各必要地點設立支局（暫定名稱）作為「對華院」的現地機關。
- 五，為應總裁的諮問，及調查審議關於「對華院」的權限事務中之重要事項并對總裁作各種必要之建議設對華委員會。本委員會中加人民間有能力有識見之人員藉以表現國民的輿論。

關於對華院事項

- 「對華院」的設置基於下記の設想：
- 一，設立「對華院」同時并設置各地現地機關
- 二，「對華院」的現地機關設置之後，即刻執行屬於其掌管事務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職務。所以軍部的特務機關及其他機關在現地機關的成立後，應將所有事務一概移交其管理。
- 三，關於維持治安上現地陸海軍與對華院現地機關的關係應予特別的考慮。
- 四，關於「對華院」所管事務中關係涉外事項（第三國關係事項）由「對華院」總裁事前與外務大臣協議。
- 五，「對華院」掌管事項中，第二項規定之「關於諸政策之樹立上各項事務」之對華院政策的根本方針一切由有關係各大臣即在所謂五相會議中決定之。對華院對於上述掌管事項中第二項諸政策之樹立，應擬具方案送五相會議決定。又基於五相決定之

政策而擬具其實行的由五具的案為其任務。

六，關於時局收拾的根本方針，全由五相會議決定。其實施工作及事務則由外、財、陸、海四大官掌管之。

十月十二日

編後話

陳老先生初稿，即為本國漢文。編者敬致謝忱。陳先生指示我們反對法西斯特，「不唯其名唯其實」，是一針、血的至理名言，所謂「妙民主」的人們拿鏡子照照自己吧！張百高先生常為本刊撰文，曾任武大教授多年。

曹樹銘先生留學歐洲多年，精通英法俄意四國文字。

張照存先生現任中央軍校教官。「發復的政治經濟思想」是鄭先生大著「五十年來中國政治經濟思想史的發展」中的一段，特請其交本內發表。

本刊二十七期所載陳鐘浩先生大文，第三段第八十二行「除維尼尼亞」除係誤之誤。第四段第七行「軍事上處於主動」主係被之誤。第十二行「能以內爭……」能係不字誤。此更正於此。

制日援我此其時矣！

曹樹銘

「制日援我」是我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一致對文明民主國家如美法蘇的要求！這一要求，並有全世界若干萬萬熱心於反侵略運動的人士熱烈擁護！

無疑的，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武力於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來到我瀋陽的最初一刹那，文明民主國家便應該實行制日援我；可是除了國聯這次決議援華以外，在事實上真肯切實援我者並不多；至於「制日」一層，在本屆國聯開會以前，根本因一二大國之顧慮與反對，深恐因決議制日，一決繼承日本為侵略國便會捲入戰爭漩渦，不獨不肯在事實上制日，並制日之決議亦不肯不敢通過。

在我國困苦對日抗戰一年又兩個月，在日本因張鼓峯事件對蘇聯屈服之後，國聯竟通過實施國聯盟約第十六條制裁日本之決議！雖是我們對於這一決議未能貫徹強制的集體的制日之主張認為不滿，但是根據決議之法律立場，我們是可以告慰的。這就是說，依照盟約第十六條之原文，因中日間已有戰爭狀態，國聯決議制日，表面上雖無「日本為侵略國」之字句，但事實上戰爭為雙方的，國聯決議制日，實已充分認定日本為侵略國，我為被侵略國！這是過去國聯所不肯為並不敢為者，而今竟為之，我們不獨對國聯無限之謝意與欽佩，同時我們更加堅定我們抗戰的信心！

話雖如此，此次國聯一紙決議，如果不能自行，與過去若干次決議同其命運的話，則我們還是不能得其真惠；其結果，不祇是畫餅充饑而饑終不能充，還有更甚於此者，即日寇勢必因國聯決議之失

效，更瘋狂的殘暴的加緊侵略我國！我們必須知道，國聯此次決議，與過去若干次決議，同一精神。這種精神是什麼？無疑的在於維護集體安全的原则，在於維繫世界和平第一環之遠東和平，在於保持人類文明於不墜！我們的民主黨與行政獨立，不獨為國際神聖條約——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所保證，且在事實上為遠東乃至世界和平之安定力。我們固不是自私自利的向國聯有所要求，而國聯決議制日援我亦絕非慈悲的，而係國聯之神聖義務！

在日寇聽到國聯決議制日以後，牠一面更加緊更殘暴的進犯我武漢和廣州，同時牠另一面更向國聯沿用上其桐油之言辭，無非想利用國聯遲決的迷夢，來實現牠「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亞洲，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之傳統侵略政策。我們毫不否認我們第四期盟約的開始，如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頭；但是我們不獨沒有畏懼懷疑的心理，反之，更加堅定我們抗戰的信心！任何艱難，在所不辭；任何犧牲，在所不惜。正為如此，在國聯決議後兩個月之今天，我們不得不向文明民主國家如美法蘇也伸其「制日援華」之要求！

現在我們要求美法蘇制日援我，係根據國聯之決議，有充分的法律之根據。同時事實上因為我們一年又四個月對日抗戰，日本作戰實力已大大地消耗，單獨侵略我國已感棘手，既無餘力去敵視任何第三國的力量，更談不到敵視英美法蘇的聯合壓力。此可於日寇在張鼓峯方面向蘇聯屈服而獲得證明。日本已到了「外強中乾」，「色厲內荏

」的階段。過去英美法蘇對於制日海權入戰爭漩渦之顧慮，已不存在。英美法蘇如果真不真的願實行國聯的決議，担負起國際條約的神聖義務，則已；否則，制日援我，此其時矣！

進一步，在英美法蘇四國當中，除了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已在此次國聯會議中口頭的說明準備參加制日一作外，美國政府在羅斯福總統及赫爾國務卿指導之下，彷彿也曾經過表示過「如果英國肯負起這神聖的義務，美國自當考慮參加合作；至於剩下的英法，我們知道，法國在遠東的利益益次於英國，同時，目前法國的外交正和英法打得非常緊熱，跟隨英國亦亦趨；所以問題的關鍵仍

在英國！英國是我們的老，自從德普魯大使來到我國以後，中英邦交更形敦睦；近年以來，以美國羅斯福之來臨，對於我國幣制有偉大的貢獻，這是我抗戰建國的堅強基礎之一，我們對於英政府這一援助之舉，自屬難以形容。可是就其而外，我們對於英法，在制日援我方面，還有很大很多的期待，希望英國保持過去迄今在國聯上之威望與地位，光榮的導起制日援我之工作；尤其是

在國聯決議以後日寇更兇殘，使我之今天！週滿此次國聯決議制日之前夕，本年九月二十七日英法代表會曾贊成我國代表顧維鈞之建議如下：「此舉第一步將法律地位確定，即由六條條約已具備，當然適用，其可實行之國家，即可依據條約，備因事實上政府與我國有困難之一家，亦望儘可以實行。至於歐局因捷克問題之極度緊張，曾為英法留餘地，我們亦當時並未強求英法之所為難者。」

在國聯決議以後日寇更兇殘，使我之今天！週滿此次國聯決議制日之前夕，本年九月二十七日英法代表會曾贊成我國代表顧維鈞之建議如下：「此舉第一步將法律地位確定，即由六條條約已具備，當然適用，其可實行之國家，即可依據條約，備因事實上政府與我國有困難之一家，亦望儘可以實行。至於歐局因捷克問題之極度緊張，曾為英法留餘地，我們亦當時並未強求英法之所為難者。」

英美外交關係

W. T. Morgan 著

毛根爲美國印地安那州白魯明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本文載於「當代雜誌」七月號，對於近代英美外交關係分析詳詳。際此世界多事之秋，英美的合作是國際和平決定的力量。

但他以爲英美關係的好轉，全繫於英國的態度。

英國人以爲一切美國人的祖先都發源於不列顛，其實美國的種族是最複雜不過的；大戰以前，美國是個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冒險家，窮人，和罪犯的收容所。自從東歐人種大量流入這個近代的經濟聖地以來，英國血統在美國是相對地減低了。在世界上大戰期內，我們就開始更加互相瞭解起來，美國正日趨於以世界爲懷，雖然她之不克加入國聯，引起了人們大大的失望。在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召開時，英美兩國原是很合作的。迨至一九二三年，美國人深信她不加入國聯是一件聰明之舉。那一年的和後來法國要擴張大集體安全基礎的努力失敗時，大半還是因爲英國故自高自傲所致。一九二五年羅加諾公約的締結，英國政治家贊成者甚少，三年以後白里安動洛格公約由於英美的推心置腹才能產生。而我軍運動却因英國的反對以致甚少進步。倫敦海軍條約力持保留空軍轟炸爲對付印度土著的一個武器。從那時起，美國人覺得日漸難於瞭解英國的外交。自一九三二年以來，他們完全榜徨歧途，莫知所措。現在我們且來解釋美國大部份人對於英國政策的看法。

自從國聯把日本烙上一個東三省侵略者的火印以後，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就邀請英法聯合不承認那些違反洛格非戰公約所採取的土。她拒絕了，這樣一來有些報紙以爲英日兩國對華成立了一個紳士協定。李頓爵士在兩年後以說：「我們的政府之

不克變換史汀生，可算是最爲遺憾的失敗。法國因爲不能藉締結東歐羅加諾條約來加強她的地位，就於兩年以後與英意締結斯德雷薩公約，以便對抗德國。但在數星期之內，英國做了一件驚動外交界的舉動——與希特勒簽訂海軍協定。因爲斯德雷薩公約在條文上規定只限於歐洲，所以墨索里尼便堅言他在非洲有自由行動的權利，正像日本在亞洲所享受的一樣。當英國反對她阿比西尼亞戰爭以尤其推在德派繼續險到地中海并請國聯實施經濟制裁以後，他自然大爲吃驚，我們相信英國雖然動她的軍艦，并向國聯呼籲，但一方面却迫使國聯同志會勿實行經濟制裁。該會在六月間發表了和平投票的結果，大部份人贊成國聯來實行集體安全制。他們顯然利用戰爭的恐怖來獲取政權。果然政府黨以集體安全爲競選的口號，得到了決定的票數，但在數星期以內，却又在黨內，個個計劃中出賣了國聯和阿比西尼亞。

當代史上英國在，的威信，從來沒有低落得像這利利害的。當國聯雖然拒絕史汀生的建議，但他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以外相資格所發表的談話，却說國聯可作英國政策的基石，以此美國政治家對於集體安全又感到新的興趣。國聯雖然暫時失去了閣席，但英國仍拒絕擴大經濟制裁，同時對國聯還說因爲美國的態度，這種制裁是辦不通的。然而羅斯福願意實行煤油制裁，要比英國的態度堅決得多。

當然，英國政治家想把美國拉入她並不有的範圍中，這既不是初次，也不是末次。

早至一九二一年，巴黎講和的一篇宣言，就曾把美國列入最困難的地位，他說英國只有在自己的債務能有解救時才可修改她對債務國的要求。美國在參戰時原是一個大債權國，因此有些英國刊物上便稱沙姆大叔爲歐洛克大叔（按歐洛克爲沙龍名劇「威尼士商人」中之重利盤剝的猶太人）。一九三一年當德奧兩國又遇破產時，胡佛總統提議付債一年。國會加以批准，特別聲明不能取消或減少。但是後來在洛桑開會的歐洲列強，却把德國賠款從三百二十萬萬馬克減至三十萬萬馬克，要求美國准作比例的減低。美國既未參加洛桑會議，這解決案當然不能加以接受。英國大使所問胡佛已加批准的聲言是完全不確的。即使我們的總統未曾明文否認這種契約英國也完全明白總統不許讓國聯會——尤其是一個自己提出這個主張的國聯會。進一步，是年秋季，英國用放棄金本位和自由貿易的手段，打消了胡佛的付債主張。

英國想把責任推到美國身上的企圖，又見於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上，沒有一國會表示願爲穩定經濟而犧牲，只有蘇聯宣佈她有二千萬鎊的貨物求售，誰願意給予長期信用即可除售與誰。羅斯福於出席各國，也願加以協助，雖然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接受他的建議。翌年，羅斯福曾對歐洲外交的一切概括，「全由美國國會拒絕贊助歐洲遷總統担保法國安全的努力所致。」羅斯福一方面出賣了阿比西尼亞，一方面却在一九三五年說美國期待與羅斯福總統作友好的合作。

當希特勒重佔萊茵蘭時，法國要求英國履行她

在羅加諾協定之下所負的義務。但她却撇開了責任，力辯與德和解為上策。英國那德行爲，使人猜疑英德海軍協定中容或有秘密條款，英國報界的反響，洩露出了高級官場強烈的親德感情，海軍界亦然。

思慮周到的美國人，永明瞭英國對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她不但自己破壞國際法，剝奪西班牙合法政府的軍需購置權，并且姑容蘇德意公開破壞不干涉，這種政策使沙姆大叔不得不責問她不守信，美國人早斷定英國在西班牙事件上，正與她在阿比西尼亞事件上一樣擺出僞君子的架子——與法西斯主義以方便和鼓勵。他們又力言英政府的懷有法西斯心理，實爲不克阻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大膽妄爲的唯一原因。他們說，英國的死硬派派深恐獨裁者一倒，共產主義會統治全球。美國人對於英國的政策，深感不滿，因爲她一方面假贊成公體安全，一方面却偷偷地援助法西斯主義。

有些報紙批評說，英國視日本爲遠東防共的前哨。在法西斯三國同盟未宣布以前，她對日本的話動，甚少關懷。但是英國一旦於對華戰爭爆發後，她又來找沙姆大叔，艾登還說他每天與華盛頓通訊消息，英國的專家和日人一樣自然無知於中國民族主義最近的發展，直到她有二千萬鎊投資的上海發生戰爭時才大驚起來，但是只有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七年十月芝加哥演說中，表示了他的憤怒之後，張伯倫才立刻有所聲明。他說：

「三天以前，全世界均注意力，被大西洋彼岸的呼聲所擱住，……他說出了本國和我國的信心，對於他籲請各國爲謀取和平而須一致努力的要求，我國政府願誠心與之合作。」

美國人很記得他一方面在說這種話，一方面却在與希特勒成立諒解，他的諾言其價值等於美國民主黨政客競選時的諾言一樣。威爾遜爵士在親德派的「觀察報」上批評羅斯福的演說說：

「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美國一向採取孤立政策，現在她開始改變了。但是我們如果以爲羅斯福的演說，含有準備把美國的遠東政策與英法或其他各國政策採取一致步驟的意向，那就完全錯了。」

羅錫安爵士也警告他的國人不要希望「美國政府來保證不列顛帝國的安全。」一個月以後，首相在基爾特說：

「我們深信兩國如能成立更接近的諒解和更一致的目的，可以有助於總統演講者及我人主張者必多。」

他又說英美商約可以「造福世界。並有利於我們兩國的商業。」艾登歡迎羅斯福的聲明但他並英國願在遠東與美國取一致的步驟，但也以此爲止。英國顯然想在後面領導反對日本，道斯檢舉日本的決議案，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比京會議中立刻受到壓制。結果毫無所得而散。

希特勒併吞奧國時英國的保守中立，更使美國相信她對保護小國的權利，並無很大的興趣。從哈里法克斯之報聘德國看來，希特勒的哀的美翰書，實在含有一種新形式，使有些批評家相信張伯倫政府事前和事後都是一個共謀犯，肯特布米大主教對於奧國被奪的態度，最足使美國輿論界爲之氣絕。他說：

「德奧聯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以爲這種聯合，顯然得到奧國大部份人民的贊助，如果這種聯合，顯早發生，則能於不流血的狀況之下發生，當然還是可以感謝的。」

請記着奧國的羅馬天主教會也完全接受這種聯合。」

在許多人看來，英國之承認奧地利，德國的一部份，未免操之過切了。

熱心的親德派，覺得難於解釋英國爲什麼會容忍捷克獨立受到威脅，如果勉強解釋起來，唯有溯源於哈里法克斯之承認捷克的消滅，就好像他承認奧國的消滅一樣。以此類推，那伯倫之不願弱小民族的權利，讓西班牙政府受德意兩國的威脅，目的無非爲了於想和墨索里尼訂結諒解，這個條約大大地增加美國與論的懷疑。美國人現在恐怕捷克會屈服，法國會不得不接受意大利的條件，甚至被迫訂結一個新羅加諾公約，使希特勒能自由伸於東歐，張伯倫在護他的政說：

「歐洲的和平全視德、意、法，英四國的態度。如果我們能促促四國解決他們的困難，則我們就可保全二十五年歐洲的和平。」

新英法軍事同盟的條文，只對兩獨裁國與兩民主國之間的公約顯示另一個步驟，雖然英國的「政變」稍延了英德中心的完成。

英國在開始密切考慮英美商約的時候，必須明瞭這種深切不信任，空氣。這種假約如果根據廣泛的，自由主義的原則，則於安定經計，必有很大的貢獻，不幸美國政府想採取自由主義的商業政策，在一個以帝國第一爲傳統的首相之下的英國，却對帝國以外各國的貿易，高築起壁壘。在熟悉美國歷史的人看來，那是一個神祕的人物。但是當他商訂了十七個多面協定的時候——與法西國家一個也沒有訂結——英國却締結了二十三個面協定或條

嚴復的政治經濟思想

鄭學稼

一 嚴復的原由

因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是一種外來的學問，所以，我們對於本國之近五十年來政治經濟學史發展的探究，要由吾鄉之嚴又陵先生始。

在今日嚴又陵（1853-1921）的名字，已被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忘却了，就是他的傑譯「原富」，也被日本的「國富論」遮蓋了。年輕的人，知道譯「國富論」的郭大力和王亞南，或許不知道嚴復。經濟學的學生，更知道李權時，唐慶增和馬寅初，也不知道誰是嚴侯官。如果執留學博士碩士的經濟學研究者，向他們嚴復的經濟思想怎樣，恐怕也很少懂得吧！

自然，這不是說精讀過馬先爾，凱塞爾或馬克思們的著作，都不及了解那嚴復的思想。嚴復的經濟思想，的確比現今的學者，要幼稚許多，然而在近五十年來中國經濟思想發展史中，把他抹殺，似乎過火些！

我們對於嚴復經濟思想的探討，要把自己置身在二十餘年前。他的思想，是充塞着「原富」的「案」語之中。

「原富」譯文的時間，依「譯事例言」，是在於清光緒二十七年（即一九〇一）八月（距第一次大革命十年）。他的譯筆，在白話文流行的今日，或許較為難讀，但是他的特點，由譯者毫無自誇地說出來：「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節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為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顧爾附益。獨於首篇篇十一釋租之後，原書旁論四百年以來銀市騰跌，文多繁贅，而無關宏旨，則

概刪要義記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專言御京版克（即銀行一稼），以與今制不同，而所言多當時瑣節，則刪置之。又部甲後，有新幣及論新

斯（James Edwin Thorold Rogers, 1833-1890

）所附一千二百一十一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之倫敦麥作表，亦從刪削。（註）我們對於這位獨自創造名詞的譯者，的確不應過分苛求！

（註）見商務印書館嚴記名著影刊第二種原富「譯事例言」第七頁。

問題不在於譯文的本身，而在當譯亞丹斯原富之日，各派的經濟學，已經雜然前陳，何以不譯葉萬士（Jevons）馬先爾（A. Marshall）等的作品。而譯老舊的古典學派的經典。據嚴氏自述，是如此：「計學（即經濟學）以近代為精，乃不佞獨有取於是書，而以為先事者，蓋溫政知新之義，一也。其中所指斥富軸之迷謬，多吾國言財政者之所同然。所謂從其後而鞭之，二也。其書於歐亞二洲，始通之情勢，英法諸國，舊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索引，是資考鏡，三也。標一公理，則必有事實為之證驗，不若他書，勃多理窟，深淨精微，不似淺學，四也」（註）。但由我個人看來，客觀的條件，主要的是在於第二，這一點我們在全書的「案」語中可以證明。

（註）同上第二頁。

我們知道嚴復生成咸豐癸丑三年，那時候簽訂南京條約（道光壬寅二十二年，或一八四二年）的恥辱，尚新鮮地印在朝野上下的腦中。素米以「聖賢之邦」自命的中國，忽被屈於夷狄，作城下之盟，自然

他「密約」。凡是贊成我們的商業政策者，自由主義化的英國人，類多懷疑英外交家是否敢於就任何建設工作。在華盛頓，他們必須與特別有影響力的經濟影響相奮鬥，但是英國却早已放棄了苦鬥的興趣了。

美國人自從明白英國在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是種羞恥以來，一般輿論對英國憤憤不滿。這種增增的不滿見之於美國最近出版的幾篇雜誌論文上。帶着挖苦性質的漫畫，也有不少，特別是諷刺英國的出賣國聯，艾登的辭職，以及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交互玩弄獅子的尾巴。有位國聯官的看門人對蕭婦說：「只有艾登先生和我們才有所關懷」，比較近一些，維格拉斯哥泰晤士報上轉載了一張插圖，描着張伯倫與哈里法克斯斯打話的樣子說：「是他送到德國去的，你想我應該去嗎？」「立契蘇時報」也有一張插圖，畫着兩個獨裁者驅使獅子表現各種技能，標題是「戲弄不列顛巨獅作貓叫」，「現代史料」挖苦艾登最厲害，說他這位閣員在外面散放香氣，而他讀武的同伴却在裏面施陰謀。可是現在我們對艾登也失却信仰了；他在墨索里尼承認西班牙有四萬萬軍的時候，聲言：

「據我所知尚無確切證據證明大量志願兵，或者亦可稱之為國民軍——到西班牙。」

我們的專家覺得在幫爾頓伐爾時代，他就早該辭職的了。

近數月中，英國的定期刊物對於美國政治復關切。「政治季刊」且出了一期英美關係問題專號，最近一期中愛德華教授發表一篇「英美聯合政策」的論文，主張兩國主要軍需的金融應該共同管理。「國民雜誌」最近幾期已不再嘲弄美國。「觀察

不會一朝忘却。此後一直至禧譯原富止（時嚴氏年四十有九），老大的中國，不特「增康恥猶未雪」，而且一層一層地疊加起來（註一），稱有良心和血氣的人，都會想到「維新」，戊戌（一八九八）的政變，不過是「圖窮」所見的「匕首」而已。在這時候，每個人——甚至獨夫——的腦中，都是充滿「富國強兵」的思想。

（註）當嚴氏六歲時（一八五八）有英法聯軍入北京所訂的天津條約；八歲時（一八六〇）有中英之北京條約；二十七歲時（一八七九）有日本吞併琉球；三十三歲（一八八五）時有法吞安南，英佔緬甸；四十三歲（一八九五）時有馬關條約。

欲強兵，須富國。國富而後兵強，這是我們幼時所讀的「策論」，因此，吳汝綸（1840—1903）在原富的序中，急起直下地說：「蓋國無時而不需財，而危敗之後為尤急。國之庶政，非財不立，國不可一日而無財，則財不可一日而不處所用。故曰：國無時而不需財；及至危敗，財必大耗，欲振其圖存，雖財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敗之後尤急」。但是，在方開始受外國資本主義改造的時期，如何可以增加其所需之「財」呢？

這裏，呈在嚴復眼中是十分明白的：所謂圖強，所謂變法、所謂維新，所謂危敗之後需財尤急，都不外是把落後的國家，迅速地趕上資本主義的途徑。一個落後國家，要趕上前去，李士特（F. List）（註）已為他們開了一個方劑，即先經過一個「自由貿易」的道路，利用先進國的技術，促進自己的工業化，而後再採取「保護關稅」的手段，使工業與先進國齊驅，到達這一階段之時，再採用「自

由貿易」。那時候的大清帝國，要不絕其皇統，要不屢其宗廟，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註）李士特生於清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死於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其名著國家經濟學（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發表於一八四一年，即清道光二十一年，距嚴氏生前十有二載。在當時，最能够發揮自由貿易學說的經濟學派，只有古典學派的創造者亞丹斯密，所以，嚴復既記他的原富，又於全書之中加以讚美云云。

「爭進出差之正具，斯保商之政，優內抑外之術，如雲而起，夫保商之力，昔有過於英國者乎？有外輸之獎，有墾運之稅（即進口貨重行出口時，所退還之進口稅）一稼，有海運之條例（The Navigatin Laws）凡此皆為抵制而設也。而卒之英不以其而加富，且延緩而失美洲。自斯密論出，乃商賈亦知此類之政，名曰保之，實則困之，雖有一時一家之獲，而一國長久之利，所失滋多，於是倉然反之，而主客交利。今夫理之誠妄，不可以口舌爭也。其證乎事實，歌自尼奈端之言天運，其說所不可復搖者，以可坐致數千萬年過去未來之疆度而無抄忽之差也。斯密計學之例，所以無可致疑者，亦與以冥同則利，與之舛騙則害故耳」

（註一）……泊斯密氏嘗出，英人首弛海禁，號曰無通商（Free Trade）（亦名自由商法），而國中諸事惟斷之為、不期自廢，蕩然維新，平均為說。此雖其智有足稱，然亦以英貨之關於他國者多，故樂用也。自此以還，民為各

導誌「會力言英國報紙不把美國政情的材料充分供給讀者，以致他們無從下手收回去。有一封信還主張英都應該在美國伸出的新政治家及民族」也對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地位大加讚揚，史帝特於最近遊美回國後，曾對「艾登事件」和「好感」的影響之一便是失却了外國對我們的信任和好感。他迫請他的政府站在民主主義一方的準備為之而奮鬥，也是獲取這是一緊不列顛帝國各分子之唯一信仰，也是獲取國美聲譽我們的唯一信仰。

「紐約時報」柏林記者也說「俄伯倫斯時消滅一切情形，胡佛於共產主義時，一定在法西斯主義威成今日的自由主義，一方面却消滅他的信仰，法西斯主義是與美國人同意與法西斯國家作戰，可是他的態度是與美國人的態度，法西斯而主孤立，他為了訂結英法海軍同盟而大遭非難，但他自己利美國海軍當局却竭力否認。

美國與歐洲各國，雖然對英表示不滿，但有一部份人信任英國，許多美國的政治家，學者，和新聞記者之所以失望，完全因為英國不敢放胆行事。曼最近會說：「當歐洲各民主國家負起他們的責任時，美國與歐洲熱烈地站在他們一方面，熱烈得全不容許他們被打敗。如果他們真的強硬起來，打倒一個侵略者，他們就可鼓起美國民衆的熱情，這種熱情將產生偉大的實際結果。」

至少第二次開戰時，我們會得再參加的機會是很大的。「圓棟雜誌」下斷語說：「美國在公海上合作保護自由權度的可能性，在今日較一九二〇年所指示的，他幾乎允許在某種環境之下援助英法兩國，但是沙姆入叔不取同情張伯倫偏袒獨裁者的態度，也不致贊成英國外交家雙重論調的「一方面化了千萬鎊於擴軍，一方面不肯以一個小錢來償債。要使英美兩國能進行，非伯倫必須做出一些鼓勵美國信任的事。他在就任首相前，便已主張強硬政治，今日他必須在更大的範圍內，與英法美三國合作，今日他必須在更大的範圍內，與英法美三國合作，海軍，尤其是金融的合作，其勢顯然是不可輕視的。」

任自然，地產大出，百倍於前，國用日侈富矣。百姓樂成，乃益歎斯密氏所持之論為重富而不可易云。(註二)

(註一)見記事例言七三至四頁。

(註二)原文一四二頁。

嚴氏當時的思想，或許尚沒有我們所說的明顯(用自由貿易的方法，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後再經保護關稅，而復返於自由貿易)，但是，他受亞丹斯密氏的影響甚深，他在全書案語中，非常努力地發揮「自由」的個人主義的哲理。他論自由與「專權」(獨佔)云：「適當格物之學，如夜方且，斯密氏以所得於水學者通之理財，知物所趨經、猶水趨平，道在任其自己而已。願任物為說，則如縱樂流以歸大壩，非得其平不止；而專權之事，如水方在山，立之障障，暫而得止，即以爲平，去其遠矣。考字書，專者專也，唯者獨木之梁。故獲利獨享者，謂之專權。而孟子則醫之專斷，大抵皆阻抑不通義也。又斯密氏謂專權之事，能使求貨者出最貴不可復加之價，而自由相競，則物價最廉」。(註)

(註)同上六十二頁。接着他補充，如郵政等事業，由國家獨佔者反可「郵費大廉」

以「自由貿易」爲前提，他排斥私人的獨佔。因爲獨佔事業「皆於本業有大利，而於通國有大損、若總其全效，則貨棄於地者亦已多矣」。而且，獨佔的成功，與國家的權力亦有關係由之，嚴氏結論者。

「且其事必絕外交而後可，使其國已弱，力不足以禁絕外交，而他人叩門求通，當爲互市之事，則貨之本。賤者，吾既以法使之成貨矣，

而他人無此，則二國之貨，同登入市，正如官私二盟，並行民間，其勢非本國之業棉地無餘不止。是故斷斷之業，可行於自封之時，必不存於互通之事，斯正然也」(註)

這個「自由」哲學，放在嚴氏腦中，不特非難獨佔，而且此後對於價值論，分配論等之研究，均以「自由」爲原則之供求規律去說明。

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的軸柱，在嚴又陵先生的思想中，把他簡化起來與價格論相混。現今國內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也有不少，由價值論走到價格論，價值論在這些官家的學者中，有許多魔術的性質，有無數形而上學的色彩，很容易把他們弄得昏亂，結果他們便走到瑞典人凱塞爾的懷裏。在他看來，是從山窮水盡之中，遇着路轉峯迴，殊不知阿拉的老鄉，早爲他們說過了。

凱塞爾排斥價值而專言價格，價格決定於供求的關係，他究竟是二十世紀的人，走了一個獨見，用「稀少原理」來說明，事實上和以供求規律解釋價格，是一樣的。嚴復也犯了這個毛病。他在全書「案」語中，拚命用供求規律說明一切。可惜今日主張價格論的人們，沒有讀過嚴復的「厚富」，否則一定會提及他的先師。如果在今日還去拉雜着海人爲自己的護符，不如打着「提倡國貨」的招牌，師事嚴侯官吧！

爲着證明「吾言之不謬」起見，不能不引嚴先生的文獻。

嚴氏要提供自己的理論，所以在「篇五，論物有價值與市價異」中，批判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他的批判，確比後日馬寅初的企圖，要高明些。他說：「案斯密氏，以產物之功力(即今之勞動)，爲

物之真值(Real price or price in labor)。值(即今之價值)之高下，視功力之難易多少爲差，其言雖近理，然智者千慮之一失也。蓋物無定價，而純視供求二者相劑之間；供少求多，難得則貴；供多求少，易有則賤。方其難得，不必功力多，方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一糜之地，處僻邑邊郡，價數金而莫售，及在都會之中，雖萬金而爭買，此豈有功力之異耶？一樹之果，向陽者以甘大，而得善價，背日者以小酢而人棄之，此又豈有功力之異耶？故值者直也，兩相當之名而對待之數也。以功力言，則物物所獨具，而無時高下之殊矣。此所以後之計學家，皆不由斯密氏物有真值之說也」。(註)

(註)同上二六至二七頁。

這個指摘十字街頭的勞動價值論的主張，有些地方到現在還可以一字不改的來應用，但是如果以之批判科學勞動價值論，那就不堪一試了。

至於用供求關係，說明分配論，又分述如下：論工資時云：「案庸(即乃)役之價」或工資不隨糧食爲貴賤，此乃要例。不備在英爲然，主護商者(即保護政策論者)多類之，以其不知凡物皆賤，全由供求相劑之所爲耳。每聞人言中國工賤，由於食賤，其受病於主護商法正相同」(註一)。不特工資與物價無關，在嚴氏思想中，與斯密的見解，幾無由分別，故云：「五證之中(註二)，所及公例，皆精要者，如：庸卒不以費爲差；庸不爲糧食爲貴賤；地異賤殊，而糧食不必異價；民亦不必從一初遷；庸之高下，常與糧食之價相反；庸本不可以法強齊云云，皆成計學中精實矣」(註三)總之嚴復的工資論，可用斯密之言：「庸者，力役

